

寧波口岸淵源及其近代商埠地帶之形成

王爾敏

- 一、宋元明清口岸背景
- 二、清初以來中國沿海開放情勢
- 三、英人之長期覬覦定海、寧波
- 四、鴉片戰爭期間英軍侵擾浙東
- 五、寧波開關及其港埠地界
- 六、結論

一、宋元明清口岸背景

近代寧波隨中英江寧條約之訂立，對外開放為通商口岸，成為歷史上著名的五口通商之一。雖然是成於近代，而其港埠地位，實依據其長期的歷史背景。

寧波為府治名稱，唐宋以來，舊稱明州，元代稱慶元，明清以後，始以寧波為郡名。寧波所在城邑，實為鄞縣。鄞邑據稱始於秦漢時代，漢代屬會稽郡，載漢書地理志。^①寧波以臨甬江之故，簡稱為甬。亦簡稱鄞，蓋屬本邑，並復古名。惟中古著聞之明州、慶元，則已成歷史陳跡，不再沿用。

據史家可靠記載，在北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將明州設置市舶務。是為明州對外通市最早的年代。有數種宋代史料本身均能支持，相當明確。^②無論北宋、南宋，明州對外通市，均佔重要地位，貿易伙伴，商舶來者，均以高麗、日本為主。故在徽宗政和七年（1117）明州人樓異建議於明州置來遠局，造巨舶畫舫以應三韓歲使。樓異因此亦改放明州知州。^③

① 鄞縣志，張恕總修，陳繼聰協修，卷1—1，頁2。（全書七十五卷，圖，凡例各一卷，光緒3年12月刊竣。）

② 宋晞撰：「明州在宋麗貿易史上的地位」載林天蔚，黃約瑟編：《古代中韓日關係研究》，頁151-157。1987，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宋氏引據「寶慶，四明志」，「宋會要」以及蔡範「市舶記碑」，作此論斷。

③ 宋晞撰「明州在宋麗貿易史上的地位」，《古代中韓日關係研究》，頁151-157。

元代在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設泉州、慶元(寧波)、上海、澈浦四市舶司，嗣於成宗大德二年(1296)合併上海，澈浦入慶元市舶提舉司。顯見慶元口岸在元代之重要，其海舶來客，仍以高麗、日本為主。^④

入於明代，在洪武之初，即設置廣州、泉州、寧波等處市舶司。並於廣州建懷遠驛以待占城、暹羅及西洋(即今南洋)諸國貢舶。於泉州設來遠驛以待琉球貢舶，於寧波設安遠驛以待日本貢舶。番貨抽分，其制略如宋、元時代。^⑤

清初康熙二十四年(1685)，開設粵海、閩海、浙海、江海四關，浙海關即在寧波。參閱張恕「鄞縣志」寧波城池全圖，當知海關行署，即在城內，在寧波府府署南鄰。海關之稱亦自此時定名。不復再有市舶提舉司之稱，遞嬗段落，甚為明顯。^⑥

(續)又，宋晞撰：「宋代明州州治鄞縣城鄉之發展」，載《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集》，頁53-62，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民國77年6月。

又，《鄞縣通志》，民國24年鉛印本，第五卷，食貨志，頁179-180，引宋代寶慶「四明志」云：又曰市舶務，淳化元年初置於定海縣，後乃移州。在子城東南，其左倚羅城。嘉定13年火，通判王珪重建。久而圯。寶慶3年，守胡渠捐楮券萬三千二百八十八緡有奇，屬通判蔡範撤新之，重其廳事，高其閭闔。內廳扁曰清白堂，後堂存舊名曰雙清。清白堂之前，中堂有屋，以便往來。東西前後列四庫，臚分二十八眼。以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號之。兩夾東西各有門，東門與來安門通，出來安門為城外往來之通衢，衢之南北，各設小門，隔衢對來安門，又立大門，門之外濱江有來遠亭。乾道間守趙伯圭建。慶元6年，通判趙師岳修。寶慶2年，蔡範重建，更以來安。賈舶至，檢覈於此。歷三門以入務，而閉衢之南北小門，容頓寬敞，防閑慎密，司存之吏亦免於戾矣。務之前門與靈橋門近。紹定元年正月火，自務之西北延燎於南，務獨免，而前門燬。二月重建，自此門之外，先後建置，皆有碑記。

④ 《鄞縣通志》，第五卷，食貨志，頁182：「元史食貨志：世祖定江南，凡鄰海諸郡與番國往還互易舶貨者，與貨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發舶廻帆，必著其所至之地，驗其所易之物，給以公文為之期日，大抵皆因宋舊制而為之法焉。於是至元14年立市舶司一於泉州，令孟古岱領之。立市舶司三於慶元、上海、澈浦，令福建安撫使發督之。每歲招集舶商，於番邦貿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年廻帆，依例抽解，然後聽其貨買。

又，同前書，頁182：「延祐四明志」：慶元路市舶庫，在錄事司東南隅靈橋門裡，宋舊市舶務。遇有舶商到港，官為抽分，其物皆貯於此，不常設庫。「至正四明續志」：市舶庫有廩房二十八間，用天開瀛海藏珍府，今日規模復鼎新，貨脈流通來萬寶，福基綿遠慶千春為號。土庫屋井前軒共六間。至元元年加蓋外門樓三間，以備關防。(臺北，成文出版社，民國63年景印)

⑤ 《中國歷代食貨志正編》，下冊，頁927。明史，食貨志，第五。

又，《鄞縣通志》，民國24年鉛印本，第5卷，食貨志，頁183：「敬止錄」：安遠驛在寧波衛後，為方國珍遺屋。永樂元年設市舶司於此。四年改為驛，以驛西方國珍花廳為市舶司，設提舉一員，副提舉五員。「成化寧波府志」：安遠驛東西門樓各一座，內官福住重建。

又，同前書，同頁：「成化寧波府志」：市舶提舉司在府治西北一里許，永樂元年設，以方谷真遺屋為之。四年又改安遠驛，以驛西谷真花廳為市舶司，添建吏目廳於右。嘉靖「寧波府志」：嘉靖中改為巡視海道司。成化「寧波府志」：提舉衙，一所魏家巷，一所小梁街，一所大池頭，俱廢。一所鹽倉門裡，今存。又提舉庫在府治東靈橋門內，宋為市舶庫。方氏據郡為廣豐倉。明洪武初改廣盈東倉。永樂三年復改為市舶司庫。

⑥ 張恕：「鄞縣志」，卷3，頁21A：「海關行署，在府治之南。康熙24年浙江設滿漢海稅監督一員。筆帖式一員。61年裁監督，以巡撫兼理。自後或委同知通判監收。或道府監收。俱由巡撫題委。乾隆元年以後，專委寧紹臺道護理。」

又，呂堅撰「談康熙時期與西歐的貿易」，《歷史檔案》，1981年第四期，北京，1981年11月。

二、清初以來中國沿海開放情勢

清代前期對外貿易，既開放四口海關收稅，顯見仍是採開放政策，不能說中國是閉關。甚至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間處理洪任輝事件而限令外商船隻只許到廣州一口收泊，也未嘗封閉夷商貿易。實不能說鴉片戰爭之前有對外閉關之史實。

自從 1498 年（明孝宗弘治十一年）葡人華士科達伽馬（Vasco da Gama）航海繞好望角進入印度洋。並於 1505 年（弘治十八年）占領印度臥亞（Goa）。繼而在 1511 年（明武宗正德六年）佔領滿刺加（Malacca），1514 年（正德九年）首次到廣東屯門。遂即起步開啟歐洲加入東方貿易變局，開始發展新的中西方交往形勢。^⑦因是於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之間，歐洲海上雄強，若葡萄牙、若西班牙、若荷蘭、若英國等，先後登場，在南亞、東亞海域，競逐海上商貿勢力範圍。包括武裝衝突，競爭自然是相當激烈。

據近人研究，在十六至十八世紀之間，華人在東亞以及印度洋上廣大海域，已有的貿易活動與經濟勢力，仍是佔踞上風。直至十九世紀英、荷強大武力壓迫及殖民領地之掌握，纔使華商一一降為附庸。^⑧

歐洲人商船砲艦並用，二百年爭持結果，葡、西、英、荷各據亞洲廣大領地。政治主權已及於中國大門，葡據澳門，即其一例。無怪英人生心，也想分割一瓣，並曾搶奪澳門，俱為實情。

中國當局，無論對外商貿易，凡事無不率由舊章。因襲前代。滿清朝廷豈知外界已發生重大變化，何曾能思考改弦易轍，因應世變？凡今日學者之批評：閉關自守，天朝意象，以至中國中心，狂傲自大者。視為無可爭議，其實均以西方立場，後世眼光看待歷史，不符前代實情，且亦誤導後世。參閱拙著：「十九世紀中國國

⑦ 郭廷以著：「近代中國史」，第一冊，頁90。臺北，商務印書館，民國55年景印本。

⑧ 張彬村撰：「十六至十八世紀華人在東亞水域的貿易優勢」載『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三輯，頁345-365，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民國77年12月印。余讀張氏此文，甚具通識。因此細心閱讀，其所標示四端因素，完全可以肯定。深信其分析深入，立論堅實有據。本人十分稱賞。惟有若干微小部分，未能同意。特舉一點在此商榷，就是此文第二節標題：中國市場的封閉性。這可充分接受，只是在本節最後把這種封閉性又稱說是「中國政府推行的封閉政策」一語，我未能同意。中國明清兩代以來，對於沿邊國家貿易未嘗有封閉政策，而是開放給藩屬的封貢貿易。入口由驛站接待，官方貨物完全免稅，私人貨品或十五抽一或十抽一，叫做抽分。官方賞賜且不在內。只是歐人東來，除了葡、荷、意大利等國也照西洋（今南洋）諸國朝貢（見乾隆26年「皇清職貢圖」），英、法等國就不願朝貢，是以不能由此管道通商，亦非中國突然間行了什麼封閉政策。因為封貢貿易是數百年自然形成的，出以兩方情願與彼此互惠。決不可視為封閉政策。這一點必須再請張先生澄清歷史家往時累積的誤解。本文因無關本題主旨，故不能在正文中詳細辯論，但在此可省略不少文筆。

又，張德昌撰：「清代鴉片戰爭前之中西沿海通商」，《清華學報》，十卷一期，北京，民國35年1月。又，侯厚培撰：「五口通商以前我國國際貿易之概況」，《清華學報》，四卷一期，北京。

際觀念之演變」，^⑨略可一探歷史背景，在此不待詳論。只肯定一句個人信持的觀點：就是這些被人稱為中外衝突的關鍵原因，只是帝國主義學者加諸中國的罪名，為侵略中國找藉口，不足以構成推動歷史的主因。真正基本動因實在於歐洲國力之膨脹，特別是英國。舍此他顧，必至於歧路亡羊。^⑩

近世英國東來，先佔印度，繼進中國通商，本起於葡、西後塵，但後來居上。商船增多，蒸蒸日上。中英最早間接貿易，至明崇禎十年（1637）威忒（John Weddell）首次到廣州。雖是中英直接貿易，一開始即不順利。此是中外常識，不待贅述。^⑪嗣後在滿清入關建立王朝之後，至康熙開放四口岸之前，曾多次有船到華，尤以對南明鄭成功在廈門互相貿易，有相當發展。顯見英商在華勢力，漸居重要地位。^⑫

按之史實，明清兩代雖然以封貢貿易為主，由於有葡人據澳門的存在，外商不循進貢管道，而加入澳門口岸貿易，同樣可以達成通商目的。實際上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開放四口通商以來，海關在口岸收稅，已給予英商專在口岸買賣貨品的機會。決不似西洋（南洋）朝貢各國隨貢使前來貿易的情勢。康熙二十四年英商即在廈門恢復商館。康熙三十七年（1698）清廷置定海權關，英商也隨之在定海設商館。地方稱之為紅毛館。當然英船之來廣州貿易者仍是歷年不絕。直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英商東印度公司也在廣州正式設立商館。事實上接納歐洲夷商的十三行，早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亦即開放沿海四口海關以前已經存在。俱可見出，清初以來，中國對英商未嘗閉關絕市，也未嘗強使一循封貢貿易制度。實際是因地方對

^⑨ 王爾敏撰：「十九世紀中國國際觀念之演變」，香港中國文化研究學報，卷11，頁61-106。香港，1980年印。

^⑩ 彭澤益撰：「中英五口通商沿革考」，《社會經濟集刊》，頁82：「其實矛盾的基因，應在於英國產業的發展，促使她在政治上的新作用。要強迫中國對他們的商人開放商埠，想假條約的力量為他們對中國外交及商務關係建立一種習慣的基礎，企圖達到撤消中國政府加於商務及對外人交往的種種約束和限制。」彭氏所見，甚是透關，可謂鞭辟近裡。討論關鍵，必須在此嚴肅澄清。前註所引拙文，原於一九八〇年代以前寫出。當時尚未真能衝破學界舊有定說。近二年中外現勢表現甚是清楚，中國天朝意象早不存在，在大國間敬陪末座。中國中心思想，早被淘汰，國人已死心踏地追隨外國行動。政治外交均早居於邊沿地位。更不自大，十分自卑。全國無不開放，並不閉關。時在今日，中外通商應該平等，而美國竟然要向中國大量傾銷烟酒。不惜大量輸入害人之物。在交涉上用盡法寶，咄咄逼人，圖窮匕見。與百年前英國強銷鴉片，所差只是用武。美國勢須攻開烟酒市場，非達目的不止。就現勢反證往日史家之皇皇定論，種種理說，豈不盡是欺人之談？他們若不名譽破產，真是上天不公，學界無恥。

^⑪ 郭廷以著：近代中國史，第一冊，頁215-218。

^⑫ 蕭致治、楊衛東編：「鴉片戰爭前中西關係紀事」，頁92-95。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6年5月印。

外通商需要，在官府的方便與商人的因應，逐漸形成封貢貿易以外的一種體制，英人可以在各口岸自設商館，當是自願而來，地方官可以容忍各夷館存在，足見並無歧視。諛稱中國拒斥通商，乃是後世史家不據史實之闢言。^⑬

三、英人之長期覬覦定海、寧波

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建浙海關於寧波，康熙三十七年(1698)於定海設關。遂使英商便利到浙通商。尤其定海更被重視，隨其開關之初，即在定海城外「道頭」地方闢建商館。世稱紅毛館。自此以後，英人覬覦定海一口之舟山島，反復表達，百五十年不變。持志之堅，隱忍之深，令人歎為觀止。

康熙晚期，由於英商在廣州設立商館，遂漸次放棄浙江商路。直到乾隆中葉，由於廣州積弊叢生，困難重重，遂在乾隆二十年(1755)有東印度公司大班喀利生(Samuel Harrison)與繙譯洪任輝(James Flint)帶貨船先到定海，再至寧波。一切公平交易，順利完成買賣貨品，滿意而去。次年洪任輝又帶兩船到浙貿易，卻因地方官注意防範，並奉諭旨加倍抽稅，強令其全船回粵。多方阻撓，乃使洪任輝等無法達成交易。洪任輝受阻之後，船雖退出，而竟至天津向朝廷舉控廣州海關之黑暗，揭示種種弊端與不公。乾隆帝遂命押解洪任輝到粵復按，最後查撤官員，亦圈禁洪任輝三年，始行驅逐回國。並自此宣布中英通商嚴限於廣州一口。洪任輝案正反映中英通商關係之齟齬。並形成浙江口岸之對西洋商船之關閉。^⑭(但對亞洲國家仍是開放通商。)

就閱讀中國近代史所得常識而言，大致上都相信：第一，廣州地方官的貪瀆苛索，是英商最憤慨與痛苦之事。由洪任輝的控告，可以確信是中英齟齬首要因素。第二，行商的騙詐與壟斷，應是中英齟齬的次一層的因素。第三，自此限定廣州一口貿易，使英商毫無選擇，無法擺脫痛苦，應是第三層次的因素。針對英商所受的不合理待遇，要想解除，也只有祈求皇帝的了解與協助。因是而使東印度公司願意

^⑬ 郭廷以著：「近代中國史事日誌」，頁17-21。臺北，商務印書館，民國52年3月印。
又、張德昌撰：「清代鴉片戰前之中西沿海通商」，《清華學報》，卷10期1，民國35年1月印。
又、汪宗衍著：「屈翁山先生年譜」，頁151，香港、于今書屋，1970年8月印。
又、梁廷枏編：「粵海關志」，卷25，頁1-2。道光19年編，臺北，成文出版社景印，民國57年9月印。
又、蕭致治、楊衛東編：《鴉片戰爭前中西關係紀事》，頁162-167。

^⑭ 郭廷以著：「近代中國史」，第一冊，頁565-588。
又、蕭令裕著《英吉利記》，收入《鴉片戰爭》第一冊，頁22-23，上海1955年10月印。

出錢，請英主派遣一個使節團到華辦理此事。終於而有乾隆五十八年（1793）馬戛爾尼（Lord Macartney）使節來華之舉。

英國派遣馬戛爾尼使華，雖是外交之舉，實為通商目的。代表中外關係轉變之史實，不但在中國近代史、外交史、商貿史上構成顯著課題，抑且為今世學者津津樂道，一直備受重視，實已形成治近代史者之共通常識。其史乘始末，經史家反復述論，自無須在此贅敘。¹⁵

馬戛爾尼這次使命中所要達到的目的和需求的願望，簡單說是充分表現於他覲見後回到北京在八月二十九日（1793. 10. 3）向中國政府所提出的六項要求：

- 一、請中國允許英商貿易於珠山、寧波及天津。
- 二、請准英人在北京設立貨倉，出售貨物，如前俄國商人。
- 三、請於珠山附近劃一未經設防之小島，歸英國商人使用。
- 四、請於廣州附近得以同樣之利益。且聽英商自由來往，不加禁止。
- 五、凡英國貨物轉運廣州、澳門二地者，請予免稅。最少亦依一七八二年之稅率，從寬減收。
- 六、請禁止對於英商任意抽稅，而出乎大皇帝所定之外者。且請將中國稅則賜下一份，俾敝國商人有所根據。因敝國商人至今亦未覩其內容也。」¹⁶

據此六項要求，具見英國於叩關求市，蓄謀之深，渴想之切。其於五十年後（1842）中國沿海開放五口通商之要求，計慮早種於此，歷五十年而不變。然未嘗

¹⁵ 近世學人討論馬戛爾尼使華專題，前後有中外學者如後：

朱傑勤撰：英國第一次使臣來華記。（原刊「現代史學」，1936年5月）收入朱著《中外關係史論文集》頁482-547。

朱傑勤撰：英國第一次使團來華的目的和要求。（原刊「世界歷史」，1980年期3），收入朱著：《中外關係史論文集》，頁548-562。

又 J. L. Cranmer-Byng: "Lord Macartney's Embassy to Peking in 1793",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 IV, Nos. 1-2, 1957/58; E. H. Pritchard; "The Kowtow in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 in 1793", *Far Eastern Quarterly*, II, No. 2, 1942.

E. H. Pritchard: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o Macartney on His Embassy to China and His Reports to the Company, 1792-94",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9, Parts II, III, and IV.

王曾才撰：馬戛爾尼使團評述，《屈萬里先生七十榮慶文集》，頁235-248。臺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67年印。

李泰初撰：英使馬戛爾尼聘華何以鍛羽而歸？《珠海學報》期14，頁101-124，香港，珠海書院，民國74年印。

劉家駟撰：英使馬戛爾尼覲見乾隆皇帝的禮儀問題，《近代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上冊，頁27-49。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8年4月印。

¹⁶ 六條要求中譯本，據朱傑勤：《中外關係史論文集》頁518。至其英文原意則見：J. L. Cranmer-Byng所注馬戛爾尼日記：*An Embassy to China* p. 150. Hamden, Connecticut, 1963: (文轉下頁)

列爲口頭禪也。其有關本題者在第一、第三兩條。第一條加開珠山（定海）、寧波，天津三口，與原有之廣州，當爲近代索開口岸之前導。其第三條要求於珠山（舟山）附近劃歸一小島，自是進佔香港之先聲。其他若北京之設貨棧，仿俄國之北京互市，廣州同樣劃割地段，援葡萄牙之據澳門。而解除英商重稅痛苦又在其次要也。如此頭等強國一流使才，表現精華，照耀史乘。帝國主義之政治家，長袖善舞，口蜜腹劍，暗藏陰機。百代以下，令人震懾。有識之士得不警惕而加強醒覺？惟乾隆答諭尙能針鋒相對，亦略知中國未可強欺。^{①7}

中英間之商貿僵局難於改善，不免時生糾葛。嘉慶十三年八月初二日（1808.9.21）英海軍少將度路利（William O'Brien Drury）率兵突佔澳門。幾引起兩國用武。後因在粵英商調停，英軍退出。中國地方大吏多受革職處分。事雖平息，中朝

（文接上頁） The first is a request to allow the English merchants to trade to Chusan, Ningpo, and Tientsin.

2nd. To allow them to have a warehouse at Pekin for the sale of their goods, as the Russians had formerly.

3rd. To allow them some small, detached, unfortified island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Chusan as a magazine for their unsold goods, and as a residence for their people to take care of them.

4th. To allow them a similar privilege near Canton, and some other trifling indulgences.

5th. To abolish the transit duties between Macao and Canton, or at least to reduce them to the standard of 1782.

6th. To prohibit the exaction of any duties from the English merchants, over and above those settled by the Emperor's diploma, a copy of which is required to be given to them (as they have never yet been able to see it) for their unequivocal direction.

①7 梁廷枏：《粵海關志》，卷23，頁8-11，載乾隆58年9月初3日（1793.10.7）高宗敕諭云：

據爾使臣稱，爾國貨船將來或到浙江寧波、珠山及天津、廣東地方收泊交易一節。向來西洋各國前赴天朝地方貿易，俱在澳門。設有洋行，收發各貨，由來已久。爾國亦一律遵行多年，並無異語。其浙江寧波直隸天津等海口，均未設有洋行，爾國船隻到彼，亦無從銷賣貨物。況該處並無通事，不能諳曉爾國語言，茲多未便。除廣東澳門地方仍准照舊交易外，所有爾國買賣人要在天朝京城另立一行收貯貨物發賣做照俄羅斯之例一節，更斷不可行。京城爲萬方拱極之區，體制森嚴，法令整肅，從無外藩人等在京城設貨行之事，爾國向在澳門交易，亦因澳門與海口較近，且係西洋各國聚會之處，往來便益。若於京城設行發貨，爾國在京城西北地方相距遼遠，運送貨物亦甚不便。從前俄羅斯人在京城設館貿易，因未立恰克圖以前，不過暫行給屋居住。嗣因設立恰克圖以後，俄羅斯在彼處交易買賣，即不准在京城居住，亦已數十年。現在俄羅斯在恰克圖邊界交易與爾國在澳門交易相似，爾國既有澳門洋行發賣貨物，何必欲在京城另立一行。天朝疆界嚴明，從不許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攪雜，是爾國欲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又據爾使臣稱：欲求相近珠山地方小島一處，商人到彼，即在該處停歇，以便收存貨物一節。爾國欲在珠山海島地方居住，原爲發賣貨物而起，今珠山地方既無洋行又無通事，爾國船隻既不在彼停泊，爾國要此海島地方亦屬無用。天朝尺土，俱爲版籍，疆址森然。即島嶼沙洲亦必畫界分疆，各有專屬。况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貨物者，亦不僅爾英咭喇一國，若別國紛紛效尤，懇請賞給地方居住買賣之人，豈能各應所求。且天朝亦無此體制，此事尤不便准行。又據稱撥給附近廣東省城小地方一處居住，爾國夷商或准令澳門居住之人出入自便一節，向來西洋各國夷商居住澳門貿易，畫定在址地界，不得逾越尺寸，其赴洋行發貨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原以杜民夷之爭論，立中外之大防，今欲於附近省城地方另撥一處給爾國夷商居住，已非西洋夷商歷來在澳門定例。況西洋各國在廣東貿易多年，獲利豐厚，來者日眾，豈能一一給撥地方分住。

惡感更深。^⑮

嘉慶二十年（1815）英方打敗拿破崙之後。隨即派遣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Lord Amherst）出使中國，力求改善中英關係，最後亦事與願違，結果白費行程。^⑯

英人與寧波口岸再度連上關係時，已在道光十二年（1832）。這時東印度公司即將停止專利權，兩年後勢將解散，結束營業。具有商業探險精神的公司大班馬加里班（Charles. Marjoribanks），決定派一商船，避公司名義，私探中國沿海口岸。所派之船即阿美士德號（*The Lord Amherst*），裝滿公司貨物。船長名叫禮士（Captain Rees），公司職員胡夏米（Hugh Hamilton Lindsay）主持交涉商務，並冒充船長。隨行則有一位德國教士郭士立（Rev. Charles Gutzlaff）卻又冒名甲利。是一位精通華語的翻譯。自道光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32.2.27）在澳門駛向東方海面，歷訪南澳、廈門、福州、舟山、鎮海、寧波、上海、寶山、經過山東到達朝鮮。再折返南行，經琉球回航澳門，為時已至八月初十日（1832.9.4）。^⑰

就郭士立日記所載，胡夏米帶商船於四月二十七日（1832.5.26）到達鎮海。再由甬江航至寧波江岸。於是展開貿易交涉。胡夏米遞上致寧波縣稟，說明船載洋布、羽毛、大呢貨物前來售賣，並引據康熙年間英國來此通商前例，盼望開市售貨。寧波地方官早已奉到上級札文，由其先時到達福州、廈門經驗，決定禁絕貿易，嚴加驅逐。因是地方上在五月九日（1832.6.7）由寧紹臺道方某，給予諭示，禁其通市。並援引往事，予以說明：

「至浙省寧波並非應泊之所。於乾隆二十二年奏奉聖旨，行文遍諭各國船商，貿易口岸定在廣東，不得再赴浙港在案。嗣後有英吉利國商人洪任輝（James Flint）、味啣（T. Fitzhugh）等，間或因風漂收到浙，即經該商貿易，業奉奏定廣東，斷難在浙成交，明白諭知。而洪任輝等商，違即開行赴廣，徑未敢故違禁約也。今爾胡夏米一船，來至鎮海洋面停泊，稟懇貿易，當經提督鎮臺前關道大人愷切曉諭，理應恪守功令，遵循定章，赴粵交易。事竣返棹歸國，何得在此逗留，殊屬非是！」^⑱

^⑮ 郭廷以著：《近代中國史》，頁267-290。

^⑯ 同前書，頁290-325。

^⑰ Charles Gu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and 1833*, 3rd Edition, London, pp. 138-256.

又張德昌撰：「胡夏米貨船來華經過及其影響」，《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卷1期1，北京，社會調查所，民國21年11月印。頁60-79。

^⑱ 許地山編：《達衷集》，卷上，頁42-43。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20年4月初版。

五月十一日（6.9）寧紹臺道又給胡夏米一件批諭：

「英吉利船主胡夏米復稟已悉，該商既知寧波不允進口買賣，所諭蓋是禮言，應即開船前赴廣東，照常貿易，誠為官商兩便之舉，切勿再延。以後總要恭奉大皇帝旨意知照爾英國，由國王傳諭爾等商人一體凜遵。不奉旨，萬不能行。所謂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彼此皆不得擅自主張也。」^②

這兩項文牘日期，均就郭士立旅行日記所確定。同時郭士立更將方道臺來諭中典故作了翻譯，並作解釋：

The Taou-tae sent his clerk to-day with several despatches, in mild language ordering us away. He quoted at the end proverb, "Whoever obeys heaven will prosper; whoever disobeys heaven will perish." He here blends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with the laws of heaven. ^③

胡夏米的商埠試探航行，對英商十分重要，使之充分了解中國沿海口岸貿易的條件背景及商業潛力。英國在鴉片戰爭之前十年，已經對於中國口岸瞭如指掌，方便他們輕易提出五口通商的要求。^④

四、鴉片戰爭期間英軍侵擾浙東

果然在八年之後，道光二十年（1840）暴發了鴉片戰爭。英國對中國發動武力侵略，所妄稱各樣理由，全是藉口要堵塞胡塗蟲之耳目，卻都不及對中國武備廢弛的了解來得具有實效。鴉片戰爭前期，英國領兵統帥之懿律（George Elliot）全權

^② 同前書，頁44。

^③ Charles Gu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1831, 1832 and 1833*; p. 200, 按：許地山《達表集》兩卷原件，應即郭士立在中國沿海活動所收集之文牘原件。故可互證濟訛。

^④ 蕭致治，楊衛東編著：《鴉片戰爭前中西關係紀事》，頁360-368。

又、呂堅撰：「談康熙時期與西歐的貿易」，《歷史檔案》，1981年，期4，1981年11月印。

按：自康熙中葉以降，沿海貿易最活躍之口岸一直未有重大變化。根據日文書「華夷變態」（林春勝、林信篤編，東京，東洋文庫叢刊第十五，昭和33年印）所載自康熙13年至末年，中國沿海與日本通商往來港口，計有福州，廈門，南京（實即上海），寧波（包括舟山），臺灣，廣州，泉州，漳州，溫州，及山東等，今人朱德蘭撰「清開海令後的中日長崎貿易商與國內沿海貿易，1684-1722」。

（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三輯，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民77年印）於口岸活躍有詳細論列，並曾作統計表，甚具功力。自於「華夷變態」一書，作充分利用。只是全文中文詞，未提上海之重要，其實所有紀錄南京船隻，均由上海出口，「華夷變態」均一一加以記載，朱女士未特予說明，至不能見其真實。

又、侯厚培撰：「五口通商以前我國國際貿易之概況」，《清華學報》，卷4期1，頁1217-1264。

代表之義律 (Charles Elliot) 起先並不在廣州用武，而帶兵北進，經過廈門亦未進佔，直驅浙江洋面，在六月初七日(1840.7.5)英軍輕易攻下定海，知縣姚懷祥、典史全福均投水身亡。英方乃留下郭士立主持定海政務，派布耳利(Colonel Burrell) 防守舟山全島。^⑤

英軍佔領定海自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七日至二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40.7.5—1841.2.24)前後整八個月之久。中間道光帝固然再四督促地方規復舟山，實際地方大吏兩江總督伊里布卻用外交手法交涉收回。其時定海縣民包祖才兄弟乘英人安突德 (Captain Anstruther) (中國官書文牘則名之晏士打喇打釐) 在嶺間測繪地形。乃率村人一舉逮捕，捕獲白人黑人各一名，獻之官方。事後欽差大臣裕祿實奏請賞給包祖才六品頂帶。^⑥此外浙省沿海尚有他處捉捕黑白夷二三十人。成為伊里布交換收回定海的外交質子。派其家人張喜往返英船交涉達六次之多。^⑦

伊里布終於在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收回舟山定海，並送還英方俘虜。實則其成功因素不在浙江而在廣東。佔領舟山本是出以英國首相訓令，宗旨作為對華的外交抵押。義律的交涉對象鎖定琦善，並不看重伊里布。在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一日(1840.10.6)懿律的照復已詳申明白：

「至云先為交還定海，後將以人釋回等意，尤以貴大臣有不合意。昨經公使大臣義面行詳明，交還定海之事，雖為容易，而乃必與別各事端一同酌議者，此次復應明晰咨知直隸爵閣督部堂琦，現在既已欽奉特命，查辦事端，善定萬全，則此一事件為與別情同論者，亦獨能與直隸爵閣督部堂琦酌商定議。且本統帥之所以請釋此人，原因於本年六月二十一日經行咨會浙省上憲，許約聽候朝廷如何批復。其間必不願向之相攻等情。迄今並未爽約。而安突德等被獲果在此時之間，實非表著友意，故有是請。倘略見貴大臣友情憑徵，自然令事善定較易也。」^⑧

直到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841.1.18)琦善義律簽訂了穿鼻草約，尤其英軍在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一日(1841.1.23)正式佔領香港。義律纔照會琦善。交還珠

^⑤ 關康已編：《平夷錄》，頁39-48。原道光24年關氏手抄本，臺北，文海出版社景印。

^⑥ 《夷事叢》，頁414-420；頁443。傳抄本，臺北，正中書局。民國59年景印。

又、《定海縣志》，馬瀛編，卷15，「故實志」，頁14-15。原民國13年鉛印本。臺北，成文出版社，民國59年景印。

^⑦ 王爾敏撰：「論張喜在中英文涉中之地位及其才品」，收入《中國近代史論集》，第一冊，頁345-359。臺北——商務印書館，民國75年4月印。

^⑧ 《文獻叢編》，期27，北京，故宮博物院，民國24年6月版。

江口的沙角、大角以及浙江的舟山。這個關鍵，義律在迫使簽約前兩天的照會中說得明白：(1841.1.16)

「今擬照依貴大臣爵閣部堂來文辦理，一面以香港一島接收為英國寄居貿易之所。一面以定海及此間沙角大角等處統行繳還貴國也。再本公使大臣須以疊次公文開載議辦各款，彙寫盟約一紙，以俾兩國和好永久。則望於貴大臣爵閣部堂就便之時，幸得面譚，以期訂明可也。」^⑳

浙江方面伊里布收到琦善正月十六日的咨文，纔與英方訂期一面交俘，一面收回定海。同時將此經過奏報朝廷：

「竊奴才於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六日。准署兩廣督臣琦善來咨。以英夷已遵照繳還定海。及該省之沙角，該督允為代懇天恩，准其仍前來粵通商，並請做照西洋夷人寄居澳門之例，將廣東外洋之香港地方給與泊舟寄住。業已據情代奏，囑即收回定海。一面撥兵前往彈壓等情。並據取到夷目義律呈遞奴才來文一件，又該夷目給與留浙頭目胞詛 (Thomas Bouchier) 等夷信三件，奴才拆閱義律呈遞之文，亦稱願將定海獻還」。^㉑

鴉片戰爭前期，英軍只佔領舟山一島，用心即在迫使中國割讓土地。是作戰計畫中預定目標，並非偶然。這與馬戛爾尼的要求遙遙呼應，佔地動機，五十年不變。英國外交家之陰鷲深穩，令人警惕。

道光二十一年春夏之交，進入鴉片戰爭後期。英國召回義律，否決了穿鼻草約。改派樸鼎查 (Henry Pottinger) 為全權公使來華。對於過去的損害要求更大的賠償，對於未來的商務要求充分的安全。對於英國利權要求絕對的保障。並決定重行佔領舟山。作為抵押。樸鼎查於四月十六日 (1841.6.5) 自英起程。六月二十四日 (8.10) 到廣東。七月初五日 (8.21) 率海陸軍二千五百人連橋北上。先佔廈門鼓浪嶼，金門鎮總兵江繼芸、福寧鎮銜游擊凌志戰死。英人留少數兵力守鼓浪嶼。於八月初進入浙江洋面。八月十三日 (9.27) 兵船駛向舟山與清軍接戰。砲轟定海，十七日 (10.1) 佔領定海，守將定海鎮總兵葛雲飛、處州鎮總兵鄭國鴻，壽春鎮總兵王錫朋先後戰死。舟山得手之後，英軍主力全撲鎮海，於八月二十二日 (10.10) 攻下鎮海，守將欽差大臣裕謙投水自盡。同時金鷄、招寶兩岸砲臺亦為英軍奪據。兵船溯甬江而上，八月二十九日 (10.13) 攻佔寧波。隨後分別驅軍，騷擾慈谿、餘

^⑳ 同前書。

^㉑ 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22，頁9-10。

姚、奉化各縣，以防清軍圍攻。英軍半月之間，席捲浙東。並在定海稅關之前高懸白旗一面，大書：「定海永不還，寧鎮要通商」十字。英人進兵用心，可全以此十字表露明白。^①

英軍侵佔浙東，盤踞半年之久，雖經揚威將軍奕經率大軍一萬三千人反攻，亦不能驅走英人。直至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1842.5.6）英軍始退出寧波，集中兵力於四月初九日（5.18）攻陷乍浦。隨後撤出乍浦，結合新到之大批援軍二千五百人，繼續進入長江。浙東惟留定海一地作長久駐紮。後來樸鼎查與中國欽差大臣耆英在江寧簽訂萬年和約十三條，在其第十二條中規定：「俟奉大皇帝允准和約各條施行，並以此時准交銀六百萬元交清。大英國水陸軍士即當退出江寧、京口等處江面，並不再行攔阻中國各省商賈貿易。至鎮海之招寶山亦將退讓。惟有定海縣之舟山海島並廈門廳之古浪嶼小島，仍歸英兵暫為駐守。迨至所議洋銀全數交清，並前議各海口均已開關，俾英人通商後，即將駐守二處軍士退出，不復占據。」^②

這條約文，使英國可以稱心滿意繼續佔據舟山及鼓浪嶼。雖然英方在中國五口開埠及賠款付清之後，終於交還兩地，而佔領已達五年之久。這尚且事小，鼓浪嶼亦尚不足論。而英國外交陰謀運用，竟長置舟山於其勢力籠罩之下，此一段史跡由於資料缺乏，迄未引起史家任何注意。^③現就英國國家檔案館（Public Record Office）資料了解，交還舟山之事，英國暗有陰謀運用，使中國地方官墜入其外交陷阱，而竟甘心簽訂不割讓他國之條約，且堅請道光皇帝批准。由於在中國官私資料均未絲毫透露，所有官方耆英奏摺多含混其辭，未真明叙。在此處應有澈底敘述，俾供後世了解。此為本文首次發現。

江寧條約之後，未出兩年，五口相繼開關互市。再至道光二十五年，對英賠款亦將付清。當時英方公使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用一個十分牽強的連環計，將廣州進城的糾葛與交還舟山問題連鎖一起，在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1845.12.10）致照會給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耆英。有謂：

「至若英兵退還舟山，並准英民進粵省兩款，甚關涉兩國之信守，彼此之友誼

^① 《夷事考》，頁658-659。據道光21年10月19日餘姚探信。時寧波剛淪陷6日。

^② 關康已編：《平夷錄》頁1355。

^③ 關於收回舟山及鼓浪嶼案。近人著作只有郭廷以著：《近代中國史》，第二冊，頁614-630。以及王爾敏撰：「耆英外交」，《大陸雜誌》，卷30、期9、10。臺北，民國54年5月印。兩種著作討論最深，敘述最詳。其中尤以郭廷以所論斷，最詳確明白。

也。於公文內亦論明，此係緊要之事，請電覽察奪。」^{⑤④}

當時者英及其外交助手廣東巡撫黃恩彤一致發覺英方陰謀動機，想以拒交舟山換取廣州進城的抵押。於是者英在十一月十七日（12.15），黃恩彤在十一月十九日（12.17）各以長篇照會及私函致復德庇時。堅持江寧條約，按約收回舟山，駁斥英方之無理要求，強詞牽混。^{⑤⑤}接著德庇時在十二月二十二日（12.20）及二十三日（12.21）兩通照會，說明只要中國同意再訂一次合約，英方決不延緩，一定依約交地。^{⑤⑥}者英經過思考，乃在十二月十一日（1846.1.8）正式照復德庇時，同意簽約，並再催促交還舟山，此一照會表達了中英間交割舟山的最終方式，深具時代意義。^{⑤⑦}

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初七日（1846.4.2）、者英親至虎門與英使德庇時會面，雙方在三月初九（4.4）正式簽定一項條約，英方稱為虎門寨特約。內容共五條：第一條說明英方重視廣州進城問題，到形勢妥當之時，再准英人入城。第二條說明中國同意出示保護英在口岸附近鄉間散步行走。其實這全是英方外交陷阱之陪襯，重點在後三條正文：

- 一、英軍退還舟山之後，大清大皇帝，永不以舟山等島給與他國。
- 一、舟山等島，若受他國侵伐，大英主上應為保護無虞，仍歸中國據守，此係兩國友睦之誼，無庸中國給與兵費。
- 一、兩國相離遙遠，不得一旦而到。是以大清大皇帝，以右所議，硃筆批准，即刻將舟山全島交還中國官憲。大英主上、親筆准如會議，則兩國

^{⑤④} PRO (Public Record Office) F.O. 233/185, 1845: No. 30.

^{⑤⑤} Public Record Office (PRO.) F.O. 682/1250, No. 126. 者英照復云：至交還舟山之期，歷次條約公文內，均已議明，以交清銀項之日為定，若謂必保日後定明，殊與前約未符，在貴公使，自係慎重公事之意，而本大臣竊所不解。舟山雖係一隅之地，而有關於兩國信義和好者最大，故特將和約一條，善後事宜一條，及貴公使信函公文各一條，一併備文照復，請貴公使查照各原案，俟銀項交足即將舟山退還中國收回，以符和約，而敦友誼。

又、PRO, F.O. 233/185, 1845: No. 34, 黃恩彤駁答之函，據約力爭，亦甚詳切。

^{⑤⑥} PRO, F.O. 682/1253, No. 129 and F.O. 682/1254, No. 130.

^{⑤⑦} PRO, F.O. 682/1256, No. 4. 者英致德庇時照會云：現接貴公使來文，再論舟山情事，均已閱悉。查舟山水係中國土地，斷無英兵退出後，復讓他國之理，且他國亦俱無強欲佔據之說。本大臣前在香港，曾將不必掛慮之處，詳悉言之。今貴公使，以火輪船抵香港，欽奉上諭如前，並稱永不准他國向中華奪取舟山等島，如公約不便，亦可私立合約，係為中國保護舟山，足徵固結友誼之美意，現已十二月上旬，交收銀款，退還舟山，均已屆期，如貴公使查照歷次成約，及本大臣節次照會，將銀款收足，舟山如期退還，再無他議：則文內所稱立約之事，俱可商辦。

宜當照議，永守此約。須至特約者。

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初九日即英國紀年一千八百四十六年四月初四日，在虎門。

大清欽差大臣耆、大英欽差大臣德公同畫押鈐印³⁸

猛銳急進貪功好勝之英國外交官，果然劍及履及，乘機挾條約特權向中國示警。事在咸豐六年九月初五日（1856. 10. 3）英使包令（John Bowring）根據傳聞，捕風捉影，竟向中國欽差大臣葉名琛致抗議照會有云：

「本公使近獲風聞、貴國將舟山或附近各洲島准給俄羅西國取用，合應請詢貴大臣，曾否據閱公件，得知此事，並將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初九日前公使德與前大臣耆公同印押議定各款內第三條，有英軍退還舟山後，大清皇帝，永不以舟山等島給與他國等語，煩貴大臣檢查原案閱悉，仍希照復可也。為此照會。」³⁹

此一「虎門寨特約」在中國外交史上向無人知曉。實則代表外人向中國要求不割讓給別國土地最早之惡例，嗣後各國紛紛要求，形至瓜分，均當以此為厲階。

五、寧波開關及其港埠地界

寧波之被選為通商口岸，其地理位置之重要，歷經宋、元、明、各朝之市舶司，俱得實證。就一般形勢而言，英人乃著眼於浙江絲茶產品之商利。⁴⁰實則絲、茶、米三項俱佔重要地位。這當是一般粗淺印象。而更現實之要求開埠動機，則為英方計畫自絲茶出產來源地直接運銷，以避免廣州一口之剝削。由於商品之吸引，港埠歷史背景之參考，引起鴉片戰爭中，浙江沿海之被英兵侵佔，特別英人在寧紹

³⁸ PRO, F.O. 93/23-3.

又，郭廷以著：《近代中國史》，第二冊，頁627-629，書中說明中英簽約之事，但不見約文隻字。而向來此點竟多被讀者忽略過去。全不知有此事。

³⁹ 佐佐本正哉編：《鴉片戰爭後の中英抗爭》，頁202。

⁴⁰ PRO, F.O. 17/73, p. 99, Mr. Henderson's letter of January 16, 1843: 「Ningpo is situated in 36°. 15 north Latitude and 120°. 25 East Longitude, It is the port of the Province of Che-Kyang, which produces more green tea than any other; and silk is extensively cultivated in the Province, It is a first rate town with a bridge of boats, and has a very extensive maritime Commerce.

又，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64，頁44A，耆英奏：「夫利之所在，人必趨之。康熙年間，暎夷本已在定海建立馬頭。因稅則繁重，商販稀少，無利可圖，仍赴廣東。百餘年來，廣東省弊絕風清，各夷效順，從無桀驁不馴之態。祇以年久弊生，各夷苦累不堪，心懷怨望，暎夷遂首發難端，至於此極。」

臺地區之偵察了解，使寧波地位地理之實質情況更加清楚。英國測量船「千鳥號」(Plover) 船長 (Collinson)，對於寧波水道，自府城以至海口曾作詳細探測，關於甬江谷地，江道寬狹部位，沿途航道水深，礁石大小，均作清楚記載。^④

英人 Henderson 對寧波亦作過實地探察，特別自外海經甬江水道，沿路直至寧波，於河谷、田野、水深均有簡約記錄。尤其根據英國大英博物館所搜藏中國舊圖，描為簡圖，送與英方商務代表樸鼎查 (Henry Pottinger) 參考，對於寧波開埠之初，頗有貢獻。且足以顯示英方對於中國沿海考察探測之努力。^⑤ (參見附地圖壹)

根據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1842. 8. 29) 江寧條約訂立。依約款第二條所定，寧波須開放為通商口岸。嗣後中英雙方在廣州議訂各口稅則之際，英方已物色各地領事人選，並積極籌備通商交易。在寧波方面派定羅伯聃 (Robert Thom) 為

④ *The Chinese Repository*, No. 8, Vol. XII, (August, 1843), pp. 429-430, Sailing Directions for the Tahiah or Entrance to ningpo, by Captain Collinson: The Tahiah 大峽江 river, or entrance to the Yungkiáng 甬江, is entered by three passages (formed by the islets called the Triangles in Thornton's old charts of 1703) all of which are difficult. The first danger in the southern channel, is a rock wick is covered at half tide, lying n. 70° E., $2\frac{1}{2}$ cables (按 each cable=608ft.) from the summit of the eastern Triangle, or Tayewshan (大魚山), If the inner Triangle, or Passage island, is kept open of the south point of the outer one this danger will be avoid. Haing (having) passed the east point of the outer Triangle, keep it and the middle Triangle close on board, to avoid a sunken rock with 8 feet on it, which lays in mid channel, and to the southward of the latter. When on the reef, a small island, 8 miles to the west of side. The second passage or that between the middle and inner Triangle is perhaps the best of the three. A mud spit extends westerly from the middle Triangle $1\frac{1}{2}$ cable, which will be avoided by keeping the joss house on the hill, open of the west point of the inner Triangle; pass as before a cable to the eastward of the latter, which must not be approached nearer than half, or receded from further than $1\frac{1}{2}$ cable. The channel between the inner Triangle, and the joss house point, has only 2 fathoms water; it is however the broadest, and best for vessels of light draught. The only danger in it is the Tiger's tail reef, which lays rather more than 1 cable, n. 40° W. from the highest part of the inner Triangle. The marks for the Tiger's tail rocks are Hoowei tsiao (虎尾礁), or the little peaked islet at the south end of the stakes in line with river hill, and also the southeast foot of the Joss-house hill in line with the first cone. The Joss-house point is steep to, and vessels will find good shelter under the fort. The river is staked across at the entrance, under the Joss-house hill, and there are sunken junks on each side of the opening through the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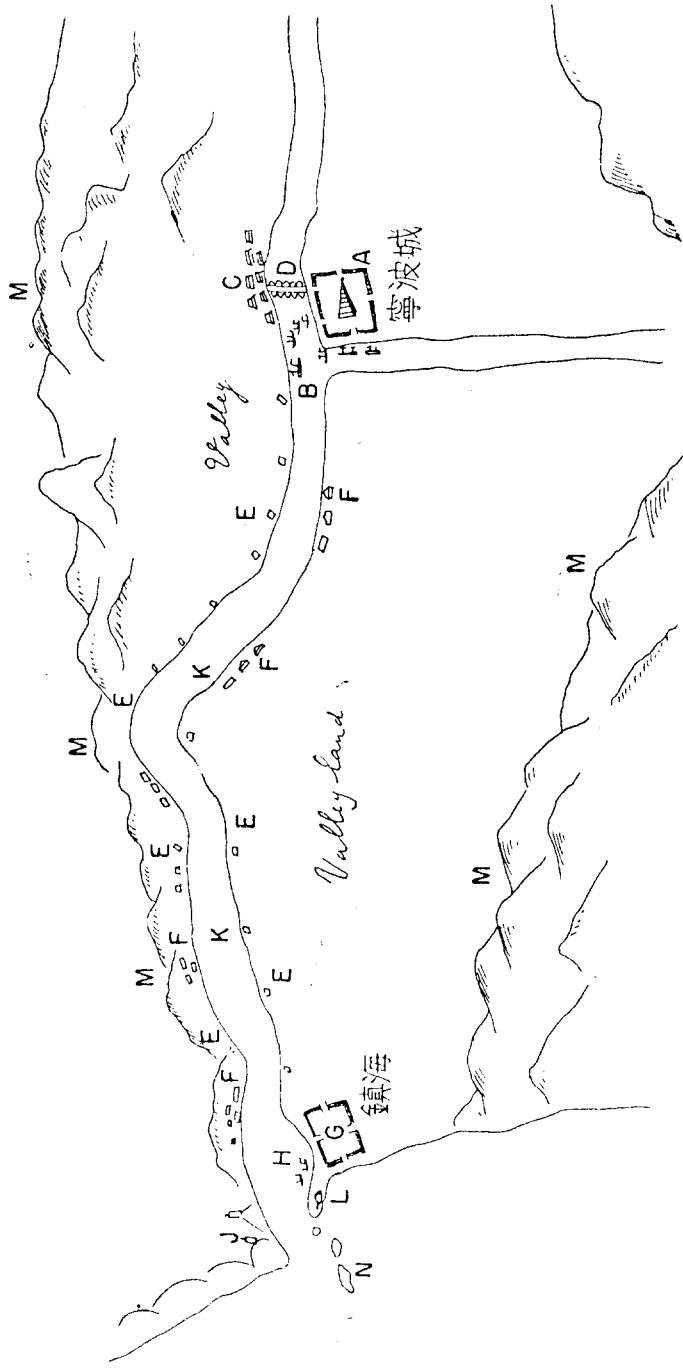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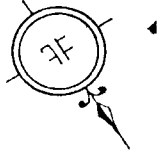
又，寧波水道溪泊交錯，便利舟楫。所有地名河流，均可參考道光二十八年刊印之《甬上水利志》，全六卷，周道遵考述。為寧波水域最全面之記錄。臺北成文出版社景印。

⑤ PRO, F.O. 17/73 p. 99B. Mr. Henderson's letter, January 16, 1843. 此信所附地圖，全為英文標示，今照原圖照樣重繪。注明中文。原圖英文聲明：此圖係採自大英博物館。

寧波港口圖

採自大英博物館原藏中國地圖摹繪

- | | | | | | |
|---|--------|---|------|-----|---------|
| A | 寧波城 | D | 浮橋 | M | 山脈 |
| B | 寧波港口 | E | 鹽田 | H | 定(鎮)海港 |
| C | 東郊區 | F | 河谷 | L | 定(鎮)海砲台 |
| G | 定(鎮)海城 | K | 水道 | 5-7 | 畝 |
| J | 守望塔 | N | 港口入口 | | 小島 |



首任領事。原計在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初一日在寧波開市貿易，中國地方官亦作準備，寧波安排迎候開市。但羅伯聃遲至十月二十五日始達定海，二十八日（1843.12.19）始抵寧波。隨帶領事署官員翻譯及侍役約十四、五人。中國方面早已派定現任寧紹臺道陳之驥，寧波知府李汝霖以及已革職寧紹臺道鹿澤長，與羅伯聃會同商辦開埠之事。由於羅伯聃要求在十一月十二日亦即西曆 1844 年新年元旦開市，寧波即定此日正式開關，對英商貿易。中國官方，指定當地「久安」、「源和」、「久和」三所錢莊，代收洋商進出口稅。並分任葉金鉉負責「久安」，鍾光建負責「源和」，鄭瑞檀負責「久和」等處稅收。^④

首先須對英國領事館之選定作一確切了解，蓋官方所在，往往成爲英商羣趨集中之地。爲形成租界關鍵。羅伯聃到寧波開關英國領事館，在與中國官員商酌及其方便英方商船貨物出入的考慮之下，並未選擇最繁華之寧波南門外的甬江岸。亦未

④ 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69，頁10B。閩浙總督劉韻珂奏。卷70，頁26B-27B護理浙江巡撫蔣文慶奏：「又據寧紹臺道陳之驥、寧波府李汝霖等稟報：本年10月26日酉刻，接據英夷領事羅伯聃，由廣東乘坐大火輪船一隻，於25日前抵定海。準於一二日內，由定海起身至寧。商辦通商一切事宜。帶有通事二人，一卽江彬，一名源華。係廣東香山人，領有粵海關監督准充通事印照。據稱羅伯聃來寧波時，約帶廣東跟來服役者四、五人，通事及一應跟隨入役，通共不過十四、五人，令其先來報知等語。除俟羅伯聃到寧，面與要約，妥議章程，另行稟報等情。臣伏查寧波海口通商，事屬創始。立法之初，必須詳明周匝，方期經久無弊。此時羅伯聃業已抵定，不日即可至寧開市，亟需遴派大員，前往經理。前撫臣管通羣與督臣劉韻珂，先經往返商定。酌委寧紹臺道陳之驥、寧波府知府李汝霖，實力經理。並令已革職寧紹臺道鹿澤長協同籌辦。一切可期妥協，自應卽行照辦。除飭令該道府等俟該夷目羅伯聃到寧，查照章程，妥爲籌辦。務期因地制宜，不准稍留罅隙。其夷人租屋賃地，尤當於議定界劃時，再與切實要約，以杜藉口。」

又，同前書，同卷，頁30B-31A，浙江提督李廷鈺奏：「伏查夷會羅伯聃，於10月28日乘坐大小火輪船各一隻，夷兵船一隻，駛至寧港，前來謁見。察其情詞，極爲恭順。該夷一遵稅課定則，並欽差大臣議定條約，並無另有措施，亦無別有要求。據稱：11月12日爲伊國正朔，不須另擇，卽於是日邀請在城文武跟同開市。查該夷前此在寧波經年，漢語漢字，俱皆諳曉。凡有會議，類多面從。而機心自用，疑慮過深。所以往往不能自決。刻下通商，事屬創始，一切瑣屑諸事，尙須要約詳盡。茲經兼護撫臣蔣文慶，添委留辦報銷局之革職寧紹臺道鹿澤長來寧。協同寧紹臺道陳之驥籌辦要約。一切可期妥協。所有稅課定則，事隸海關，由該道查照章程辦理。其相度馬頭，建設夷館，應由地方府縣勘辦。昨據該會面稱：一時未能準定何地，日來亦尙未貿易。該夷現於城外江北地方，賃居民房，暫爲居住。」

又，PRO, F.O. 17/88, pp. 91-92: John F. Davis to Earl of Aberdeen: 「Mr. Robert Thom, Consul at Ningpo was a merchant at Canton, and entered Her Majesty's service as an Interpreter in 1840.」

又，PRO, F.O. 17/78, p. 182, Robert Thom's Circular: 「The Undersigned has this day received an Official communication from the Intendant of Circuit, in which His Excellency states, that the three following shroff-shops are specially appointed to receive Duties on behalf of Foreign merchants, and that their receipts for the same will be considered as equally valid with those of His Excellency himself, 1st The 久安 Kew-an shroffshop, of which the responsible person is 職員葉金鉉 Yé-king-hung in Government employ, 2nd. The 源和 Yuen-Ho shroffshop of which the responsible person is 生員鍾光建 Chung-kwang-Keen having the Literary title of a Sáng-yuen (生員)。3rd. The 久和 Kew-ho shroff-shop of which the responsible person is 職員鄭瑞檀 Cheng-Suy-tan in Government employ.」

選擇康熙初關口岸時之寧波東門靈橋門。^{④④}實則竟選定寧波北門即和義門外，位於甬江支流之上，稱做餘姚江或慈谿支流。在當地一向稱之為「江北岸」，直迄現代。而英方音譯即稱為 Keang-Pih-Gan，屢見於官方文書。羅伯聃選租領事館基址，於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初一日（1844.2.18）租得和義門外江北岸盧姓房屋一所，合計五十間，年租金七百元，分四季交付，同時簽訂十年契約，期內不得加價及轉租。洋人居住通商之租界，遂即自江北岸地區開始初步，^{④⑤}茲附後日英國官方所繪製之地圖作為參考。^{④⑥}（見附圖貳）

羅伯聃在開埠通商之始，當與中國地方官首先商定開埠進出商船之確實地點，先須決定商船上下貨物之地，在其決定選租領事館之先必須及早宣告，是以在寧波開埠當日，即因中國官方之同意，向英商發布通商條章，指定在寧波北門外之江北

④④ 《華夷變態》，第一冊，卷11，頁575。康熙25年放洋船隻自靈橋門出船。

④⑤ PRO, F.O. 228/31, pp. 543-544: Received from W. Thom H.B.W. Officiating Consul for Ningpo the sum of three hundred and fifty dollars in deposit as proof of W. Thom having rented my large house with half an acre of garden ground attached to it. Situated on the Northern bank of the Tsyekke branch of the River, opposite the city gate called the Ho-ee man, now occupied by the Keen fa Tea Hong on the following terms. The yearly principal rent \$680. The yearly subordinate rent \$20 say in all seven hundred dollars 700 per annum, the year to count from the 1st day of the first moon of each year and the rent to be paid quarterly at the rate of \$175 say one hundred and seventy five dollars each quarter, upon due payment of which I hereby engage that for ten years I will neither raise the rent nor let the house to another person, W. Thom may be at liberty to quit at any time on his giving six months notice beforehand, and on his giving up the house the deposit money will be returned. All repairs of roofs outer walls & I the landlord engage to make good but all changes or fitting up of the interior of the house. must be at the expense of the tenant. Dated Ningpo 18th February 1844 being the first day of the first moon of the 24th year of Taonkwang as witness my hand, R. Thom. H.B. R's

見租 徐魯新
代筆 沈香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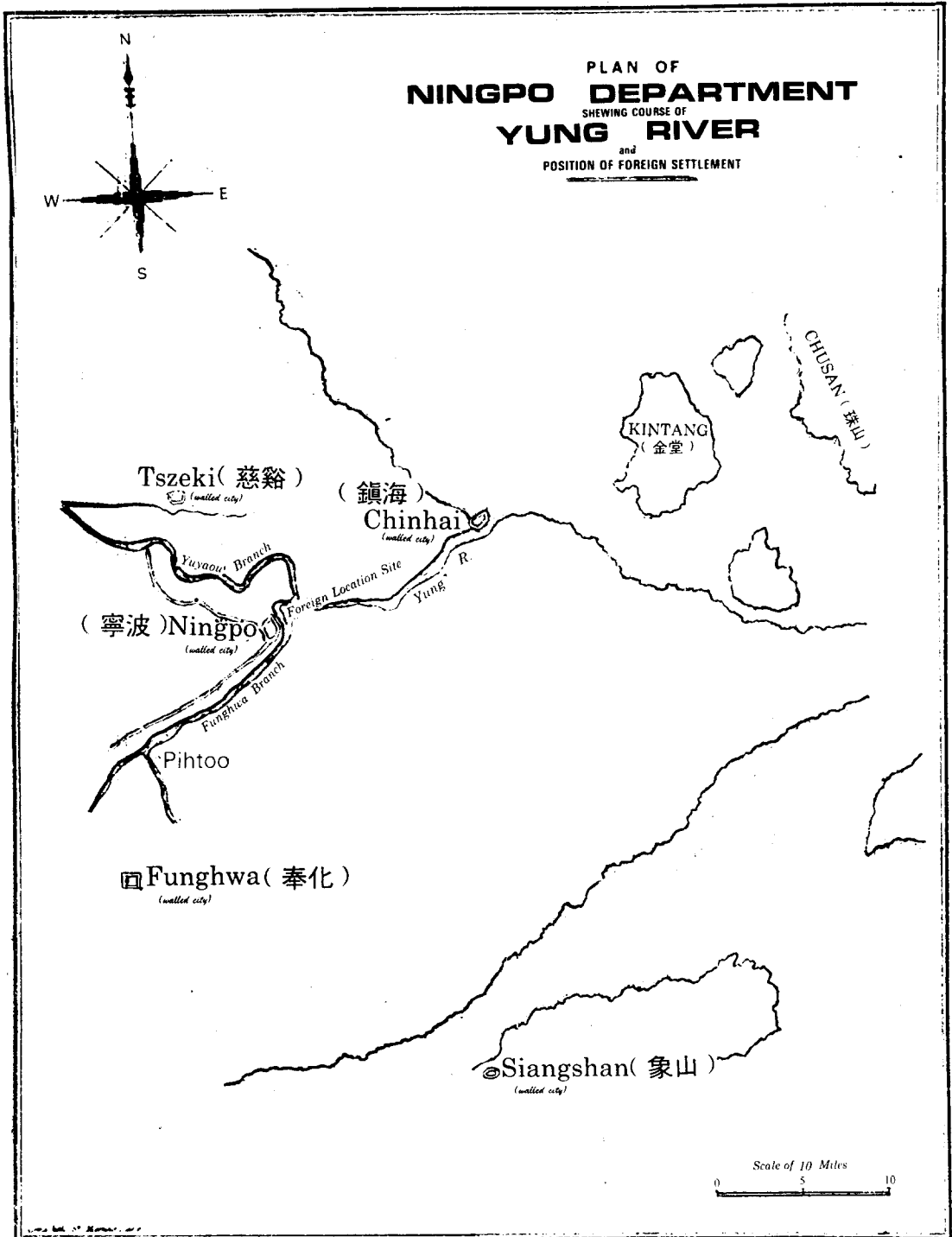
又，PRO, F. O. 228/31, p. 546.

租契

立租契英國領事羅伯聃，情願租到江北岸地方，坐落甬東十圖，土名鳴珂里盧松房，坐北朝南，九架平屋參全楹，東畔牆外小屋壹棟，共計四十五間。屋後餘地壹方，小屋五間，大門壹座，四圍門扇壁絡俱全。凡係外面屋脊之類並滲漏等情，均請盧松房修補。三面議定，每年計租洋銀陸佰捌拾圓正，作四季交清，不致少欠。議明拾年之內，每季租銀交清，不得加租別召。倘或立意搬到別處，於六個月之前通知房主，任憑遷移，亦不得留阻。令欲有憑，立此租契存照。計開每年應付小租洋銀貳拾元正，亦作四季交付，並照。當付探租洋銀叁佰伍拾元正，並照。外附合同交單壹紙，並照。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初壹日，立租契英國領事羅伯聃（R. Thom）

見租 徐魯新
代筆 沈香亭

④⑥ PRO, F.O. 405/7, p. 67, Map of Ningpo, Jan. 14, 1862, from Hong Kong Consul Daniel Brooke Robertson to Mr. Hammand.



岸，當地民人稱之爲「李家道頭」，作爲上下貨物之所。同時定出作業時間。事見1844年1月1日英領事通告規章第六條記載：根據中國官員指示，英國船隻准許於每日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之間，在寧波城外甬江支流北岸，名叫李家衙頭地方卸貨或上貨。^{④7}

當然，羅伯聃在選定領事館之先，也早已考慮洋人居處之寬敞而且要有發展前景。寧波南臨奉化支流，會合甬江幹流，東、北兩面均臨慈谿支流之餘姚江。是三面環水，然南東兩面當兩支流會合處，均是舊日商船聚集之地，最爲繁華。當然人烟稠密，地價較高。中國官方不願洋人與華民雜居，於是使羅伯聃最後選定江北岸地帶。接近城邊稍有住家，其外俱是稻田，四周空曠荒僻。起初他先住在一所商家通生行，然後與其隨員考慮了寧波各地情況，在開市之始，尚未租定館址之前，曾做過詳細記錄。對於當時寧波地理環境相關位置，交代十分清楚。^{④8}

④7 PRO, F.O. 17/78, p. 182, January 1, 1844, Regulations, No. 6, 「British vessels will only be permitted to discharge or load at the place appointed by the Authorities on the northern bank of the river known by the Chinese name of 李家衙頭 Lee-Kea Taou tow and between the hours of 8 in the morning and 4 in the afternoon.」

④8 PRO. F.O. 228/31 pp. 493-531, 3rd Jan. 1844: We find that the Hounorable Consul is now dwelling in the *building* formerly occupied *as*, a wood yard by the 通生 Tang-Sung Hong, which he has changed into a public Office. This is on the Eastern bank of the River, the local name of the spot where it is situated is 三官堂 San-Kwan Tang and the local name of that part of the Northern bank of the River directly opposite the Said Public Office is 上白沙 Shang-pih-Sha. The anchoring ground of English ships being thus determined upon, we the said Intendant and others have hired a spot ground on the Northern bank of the River Known by the local name of 李家衙頭 Lee Kea Taou-tow.

We the Intendant and there find that outside of the city of Ningpo, there are only three points or places where British Subjects and Natives are likely to meet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these are 江下 Kiang-ha or the upper part of the River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floating bridge 江東 Kiangtung or the Eastern bank of the River and 江北 Kiangpih or the Northern bank of the River and we have accordingly to propose the following boundaries.

Beginning with 江下 Kianghea or upper bank of the River lie where the city is situated and travelling in a Southerly direction let in draw an imaginary line from the 靈橋門 Ling-Keaonmun (or City gate nearest to the bridge of boats) along the City-ditch (which is also used as a Canal) till we come to a spot called 濠河頭 Haonho-tow (about halfway between the bridgegate and South-gate) which will from the boundary in that direction travelling in a Northerly direction, let us draw an imaginary line from the 和義門 Ho-ae-mun (otherwise called the 鹽倉門 Yen-tsung-mun, or City gate between the North and East gates, quite close to the River on the Tsye kee branch) to the spot called 北廊堰 pih-lung-an a little way beyond the North gate which will form the boundary in that direction

Proceeding to 江東 Kiang-tung or Eastern bank of the River, and travelling in an Eas-

由此看來，當可充分考見，羅伯聃在年尾到達寧波後，利用十餘天時間，會見中國官憲，選定開埠地帶，宣布商船進出鎮海，航行甬江，以至上貨下貨作業時間，同時亦租到領事館居地。足見羅氏對寧波早有認識。自可上溯到鴉片戰爭期中英人對浙東之佔領。茲就 1861 年英國艦長丟樂德克 (Roderick Dew) 所繪寧波城廂與商埠地區周遭水道圖，以備了解。^④ (見圖參)

羅伯聃就任英國駐寧波領事，隨其同來職員及中國通事先後有十四五人之多。除前文註中引及江彬、源華兩名中國翻譯外，其他英方官員尚有副領事列敦 (T. H. Layton) 翻譯官星察理 (Chas. A. Sinclair) 以及第一助理 P. Hague，第二助理 F. Hertslet 等人。羅伯聃確是精明能幹，並具有商人背景。但不幸羅氏竟在道光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1846. 9. 14) 病故於寧波，英方所派代理領事瑣離完 (George Grey Sullivan) 剛在羅氏將死之前一日到任。^⑤

(續)terly direction, the boundaries will be 賣席橋 Mai-tseih-Keaon (or the bridge where straw mats are sold) 四眼橋 Sye-yen-Keaon (or the four-eyed-bridge) and 河沿 Ho-yen or line of the Canal that runs there; travelling in a Southerly direction 新河頭 Sin-ho-tow or the new canal will be the boundary, and travelling in a North Easterly direction an imaginary line drawn from the 沿江 Yen-Kiang (or bank of the river) through the 冰廠 ping chang (or ice houses) will be the boundary.

Proceeding to 江北 Kiang-pih, or the Northern bank of the River, and travelling in a Northerly direction, the boundaries will be formed by the following 小石橋 Seao-She-Keaon (or the small stone bridge), 三寶橋 San-paon-Keaon (or the bridge of the three Buddha) and 河沿 ho-yen or the canal which run across. Travelling in a North Westerly direction, the boundaries will be formed by a line drawn from 沿江 Yen-Kiang or the bank of the River at 浮石亭衛頭 Fow-shi-ting taow-tow (or the landing place of the pavilion of movingstone) and in a North-easterly direction by a line drawn from the bank of the River through 中白沙 Chung-pih-sha or the centre of the bank of white sand (a little nearer Chinghai than when the ships are now anchored).

④ PRO. F.O. 405/7, p. 30, Ningpo Map, June 18, 1861, Roderick Dew to James Hope, on "Encounter".

又據《夷事叢》，頁889-890，道光22年4月3日劉韻珂奏云：「又據駐守慈谿縣之寧波城守營都司李宗白等探稟：該夷有向寧郡居民逼索浙省十一府志書及黃河、揚子江地圖情事。」由此足見英軍佔領浙東時期，在寧波搜集浙省方志以備了解地形、水道、人情、風俗之用心。

⑤ John King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pp. 329-330.

Consul Thom had entered upon his duties auspiciously, arriving at Ningpo in H.M.S. *Medusa* on December 19, 1843, and presenting his credentials to the taotai on the following day, accompanied for the moment by a suite of British officers from Chusan. Save for a brief trip to Shanghai, Thom did not leave Ningpo again before his death at the age of 39 on September 14, 1846. For much of that time he acted as his own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which inevitably lowered him in Chinese eyes. Indeed, he confessed himself "as yet quite a novice in Government employ". It seems quite plain that his commercial background hit the eye of all beholders. For an official in China he knew far too much about trade. With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e soon drew up and published regulations for governing British subjects, and for British merchant vessels, together with various circulars, and a paper of "Hints" to British merchants. His con-

英國多年來不忘情於浙江貿易，寧波開埠之始，尤抱極大期望。市易之物，羅伯聃向樸鼎查作一些商情報告，對入口食米出口綠茶有樂觀評估，與時價及進出貨報告先後提出。^①到開埠後兩月，羅伯聃貨品銷售報告尚具有相當信心。仍將寧波看待為良好市場，但卻條列出若干滯銷商品。建議別再運來羊毛、棉花、毛線、棉紡織品到寧波。^②而事實上寧波出入口都每下愈況，寧波開埠不到兩年，中外貿

(續) sulate was established in a building formerly occupied as a wood yard by the Tung Sang (T'ung-sheng) firm in the region known as San-Kuan tang ("Hall of the three officials") on the east bank of the river. A customs examining shed was erected on ground leased on the north bank of the other river (two rivers meet at Ningpo) opposite the Consulate at a place called locally Lee-kea-taow-tow (Li-chia-tao tou, lit., "head of the street of the Li family"). The river bank at that place was known as Shang-pih-sha (Shang-pai-sha), and British ships were to anchor between it and the opposite river bank in front of the Consulate.

又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76，頁31：梁寶常奏：「前准欽差大臣耆英咨會。接據英吉利德魯來文。寧波領事羅伯聃告病。調派廈門領事署理等因。當經轉行寧波道府知照去後。茲據署鄞縣知縣畢承昭稟報。英夷新領事瑣離定(完)於7月23日。由廈門乘坐二桅夷船來寧。囉伯聃於7月24日病故等情。伏查英夷領事之人。惟嗎禮遜、囉伯聃二名。盤踞最久。情形俱極狡謬。今俱天奪其魄。接踵而亡。現在新領事項離定(完)。甫經到甬。已飭該管道府查照條約。妥為撫馭，以示鞫糜」。

① PRO, F.O. 17/78, p. 185: Private Letter from J. Mackville Smith to R. Thom: 「In Teas I think we are likely to hare a considerable trade next season, as they can be bought here at a cheaper rate than to Shanghai and about two Taels cheaper than to Canton, Green tea will be the princeple export artic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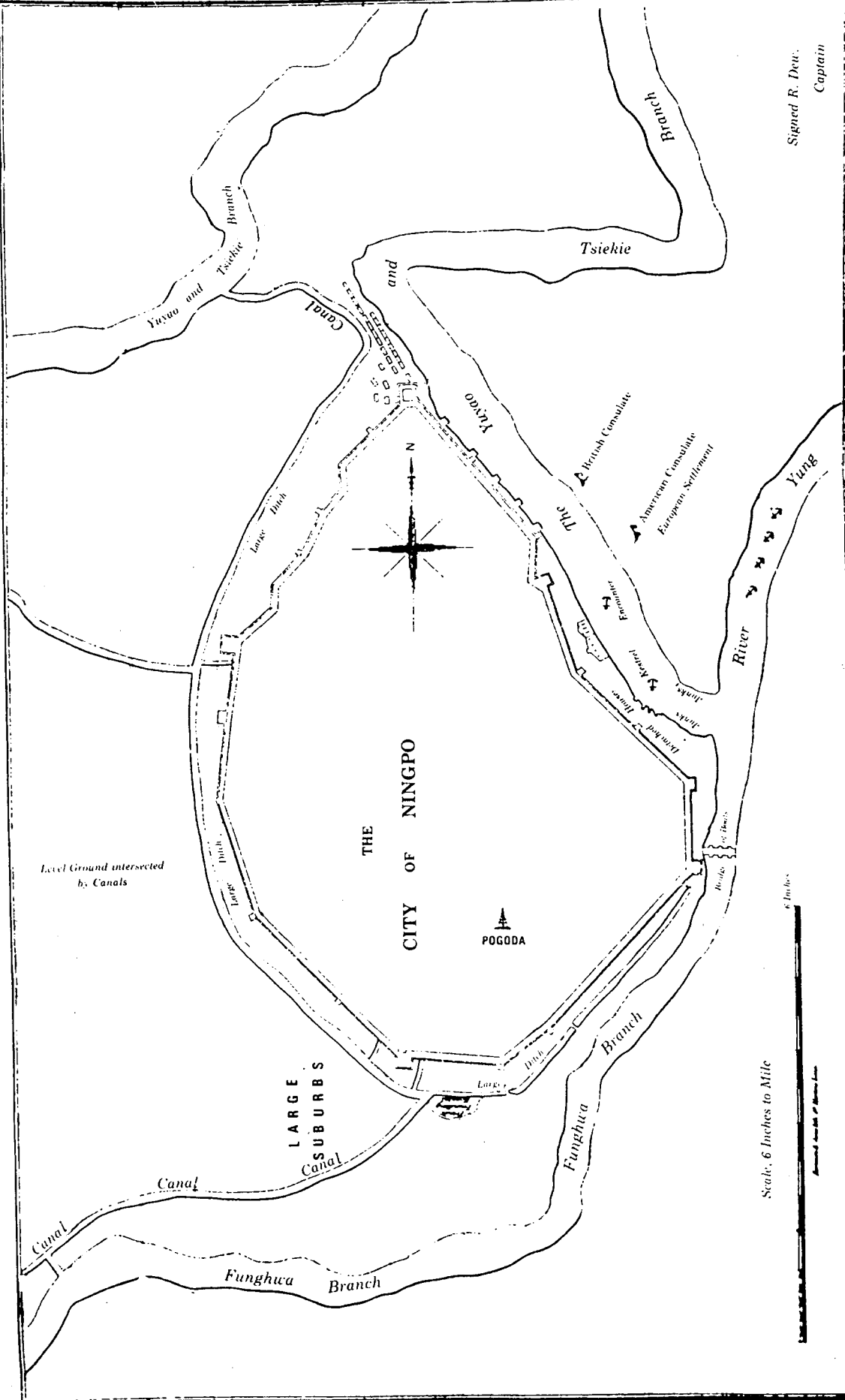
又、PRO, F.O. 17/78, p. 182: Robert Thom to Henry Pottinger, Jan, 20, 1844: Mr. Smith [who is connected with the House of Bell & Co. Macao, now acting as supercargo of the Helen Stewart (a British ship)] in his [private] letter [to me] alludes to an attempt at a Tea monopoly on the part of one Fang qua or Fanqua, who was formerly at Canton. This is the first attempt at monopoly that I have heard of since I came to Ningpo, and the moment that I can get the Sir Edward Ryan [a British ship] off my hands, I shall proceed to take up the case. (the Friend of China and Hong Kong Gazette, Victoria, Saturday February 10th 1844.)

PRO, F.O. 17/78, p. 182, R. Thom to H. Pottinger: I should like very much to see a few cargoes of Rice and Paddy brought here for sale. The price is now high and rising; could we manage to bring it down by an importation of Rice from abroad, it would render the Foreign Trade very popular among the body of the people. This is a political end worth gaining, and I hardly think that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Rice market should be lost sight of altogether (the Friend of China and Hong Kong Gazette, Vitoria, Saturday February 10th 1844)

② PRO, F.O. 17/81, p. 195, March 23, 1844, R. Thom to H. Pottinger, I have at length the satisfaction to inform Your Excellency that the Brig nautilus, Captain Gilson has loaded a cargo of Teas at this port [Ningpo] and is now about to leave, bound for London, touching only at Hongkong on her way down.

Her cargo consists of

Congou	144,595 lbs. (磅)
Pekoe	575
Twankay	87,990
Hyson Skin	3,413
Hyson	414



Level Ground intersected by Canals

THE CITY OF NINGPO

POGODA

LARGE SUBURBS Canal

Canal

Funghwa Branch

Funghwa Branch

River Yung

Tsiekie

Branch

Yayuo and Tsiekie

Canal

Yung

British Consulate

American Consulate
European Settlement

French Consulate

German Consulate

Japanese Consulate

Portuguese Consulate

Russian Consulate

Spanish Consulate

Swedish Consulate

Dutch Consulate

Belgian Consulate

Prussian Consulate

Austrian Consulate

Italian Consulate

Spanish Consulate

Portuguese Consulate

Signed R. Dew.
Captain

Scale, 6 Inches to Mile

6 Inches

Revised March 27, 1860

易，日漸萎縮。洋商羣趨上海，少來寧波。顯見其口岸優勢已為上海所奪，羅伯聃親身見此光景，數度商務報告，均說明日益衰退實情，並申述距上海太近，外商捨此就彼情形。同時在羅伯聃去世後，其繼任人瑣離完也在 1847 年 1 月作出寧波商務衰退之報告。⁵³

(續)	Young Hyson	7,636
	Gunpowder	1,351
	Imperial	721
	Total	246,695 (磅)

the value of which may be roughly estimated at about \$55,000. She has further on board 52 Bales of Raw Silk and 30 Bundles of mato for Hong Kong.

又、PRO, F.O. 17/81, pp. 196-197, March 23, 1844, R. Thom to H. Pottinger, The few months experience we have already had of the Ningpo market, has given us a tolerable idea of the goods most likely to answer here. White long cloths, Ningpo is a very good market for these, and can take them off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Grey long cloths, also a good article here, but they do still better at Shanghai than at Ningpo. Chintz and printed goods, consumption most limited. Cotton Yarn, unsaleable.

Woollens, Long-ells, Camlets, &c , &c., &c., these are almost unsaleable at Ningpo, and should never be brought here, as Shanghai is a very much better market for them.

Rice, generally speaking a good and safe article.

Iron and all metals, consumption extremely limited.

Strait's produce, Ningpo is good to a small extent, but Shanghai is a much more extensive market for all kinds of Strait's produce than Ningpo.

Sales are very difficult to be made for cash, unless the article chance to be in great demand, as silver at Ningpo is just now both scarce and dear.

又、籌辦夷務始末，卷 71，頁 25，梁寶常奏：至寧波海口通商，自開市後，共來貨船六隻，隨賣隨去。現僅存船一隻，內裝洋米玻璃等貨，尚未銷售。關稅截至現在，共收稅銀一萬六千兩有奇。據羅伯聃稱：現到之船，多係粵東銷贖之貨，此後如至秋冬，或再有貨船來寧等語。

⁵³ PRO, F.O. 17/101 p. 150B. R. thom to J.F. Davis 31th July, 1845. The native Honggs who were at first so eager to engage in the foreign trade have not been more fortunate. Two or three of them have shut up, and the rest prefer employing their funds in the home trade as offering a more *certain* remuneration, so that on taking a general review of matters, I am compelled from a regard of truth to state, that our prospects of trade at Ningpo are much *worse* at this moment, than when I hoisted my flag on the 1st of January 1844.

又、PRO, F.O. 17/109 pp. 314A~314B. R. Thom to J.F. Davis 10th. Jan. 1846. Foreign commerce does not seem distinct to flourish at Ningpo.

The cause of our failure is very easily pointed out, Shanghai has drawn everything to its center, it has flooded this market with its superabundant importations, and attracted thither the Tea men who were previously inclined to patronize this port.

又、PRO, F.O. 17/123, p. 190A. G.G. Sullivan [Ningpo] to J.F. Davis: January 9, 1847.

I have the honor to enclose to your Excellency a Return of Trade for the year ending the 31st December 1846.

I regret to observe that the value of Imports and Exports have dwindled to about on third of the amount of the preceding year.

At this moment there is only one resident merchant, Mr. Waterhouse, and the greater

由於寧波貿易之毫無起色，英商徘徊瞻顧，興趣缺缺。乃使英政府感到維持一個領事館及其人員開支是負面的消耗，十分不值。英國外相巴麥尊（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於1848年至1850年間，充分表現厭惡之情，而有與福州兩口一併放棄之計。但這樣豈不便宜了中國。自就考慮到請中國另開兩口，以為交換。顯然是帝國主義外交運用之一貫作風。在道光末年以來，時常出現，而此時（1850年代前後），則是最早展現，值得另作探討，在此無須延伸題外太遠。⁵⁴

寧波口岸停滯，不見興旺，顯與洋商貿易興衰息息相關，洋人進止為動力樞

(續)portion of that gentleman's time is spent at Chusan where he still retains possession of his house.

⑤ PRO, F.O. 17/146 pp. 164A~164B Bonham (文翰) to Palmerston, Dec. 26, 1848.

Nearly the same observations with regard to the inutility of the present Establishment appear to me applicable to Ningpo. There certainly does not seem at present any immediate hopes of a Trade centring at that Port; but as it is nearer to the tea Countries than Shanghai, it may undoubtedly some day or other become a place of commercial importance; as a Port it has the advantage over Shanghai of being much more easily approached by shipping, and I confess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I am at a loss to account for the preference given by the teamen to the Port of Shanghai.

又、PRO, F.O. 17/152 pp. 215A~216A Palmerston to Bonham Sep. 14, 1849.

I have had under my consideration the reports of the trade at Foochowfoo and at Ningpo, for the year 1848, which form inclosures 7,8,9 and 10, of your despatch No. 37 of the 28th of March last, from which I regret to observe that the prospect of trade at those two Ports has continued during the last year as little encouraging as in former years.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wish to reduce within as moderate a compass as practicable, the Consular establishment in China; and it would not be right to maintain Consulships at Ports where there is no trade.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would be unwilling to take any step which might in its consequences lead to reducing from five to three the number of Ports at which British subjects are allowed to trade, and which might wear the appearance of a disposition on the part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 relinquish advantages conceded by the Treaty of Nankin.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therefore instead to propos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two other Ports on the coast of China should be substituted for Foochowfoo and Ningpo as places of Trade for British subjects.—

又、PRO, F.O. 17/166 pp. 212A~213A Bonham to Palmerston, April 15, 1850.

Still, I fully concur with Sir John Davis in thinking that we should hesitate before altogether abandoning Ningpo, notwithstanding its present unimportance; and should limit the question of substitution to the single Port of Foochowfoo, where, as six years have clearly proved, we have absolutely nothing to lose. Ningpo possesses great natural advantages over Foochow; in the first place its close proximity to the Island of Chusan gives it in a certain degree a political importance—it has a good harbour, is easy of access to vessels of large further, and favorably situated with regard to Hangchowfoo (杭州府), Shanghai, and the Tea and Silk Districts. Moreover, the people in the City and the neighbouring country are very well disposed towards foreigners, and altogether, it is much superior to Foochow, where the impracticable character of the Min River would alone suffice to make us despair of ever seeing Foreign Commerce established at that Port.

紐。不過中國本身動亂，卻又是西方外交家、政治家所要看得準抓得緊的大好機會。寧波口岸之重大變化，洋商租界領域之真正確立，與太平天國軍佔領寧波有密切關係。咸豐末年（1860年代）纔真正是西方強權在華伸張勢力之天造良機。

雖然外人租界土地，開始建屋在江北岸空曠稻田之區。但因商業不易擴張，竟在十餘年間未能形成興旺之港埠。及至咸豐末年，太平軍佔據寧波，影響中外通商。終於使英法軍直接捲入戰爭。當地已革職寧紹臺道張景渠，利用這種機會，聯合英法在華之海陸軍，在 1861 至 1864 數年間，對付寧紹臺地區太平軍。在 1862 年 5 月 8 號這天，英國海軍艦長丟樂德克 (Roderick Dew) 通知寧波太平軍守將，令其退出寧波。雙方衝突開火，肯尼中尉 (Kenney) 受重傷而後死。當時浙東沿海，仿照江蘇上海地區美國人華爾 (Frederick Townsend Ward) 所組成之「常勝軍」(the Ever-Victorious Army) 方式，而由在寧波英國軍官丟樂德克分派若干英國軍士，招募中國青年壯勇，組成所謂之「常安軍」，在浙東助清兵作戰。更有影響而發揮戰力最大者，則為法國軍官勒伯勒東 (A. E. le Brethron) 領導組織之中法混合軍，亦仿常勝軍規模，號稱「常捷軍」。勒伯勒東戰死，由達爾第福 (Tardif de Moidrey) 繼任領導。達爾第福戰死，由德克碑 (D'Aiquebelle) 繼任領導，直至德克碑與浙西湘軍統帥左宗棠會師，並恢復全浙。由於英法軍之協助收復寧波，外人租界地區，又得到如同上海一樣的特權利益。是以寧波港埠之發展，亦與上海具同等意義。⁶⁵

寧波商賈無有起色，洋商興趣缺缺，江北岸之新闢商埠，亦難免保持乏人問津之空曠地帶。時機轉變因素，亦如上海。中國內部之動亂，造成外人勢力在華之擴張。帝國主義者，深明政治意義重大，由於太平軍之佔領寧波城，列強聯合行動，一面助清軍攻打太平軍，一面為商埠地帶外人安全起見，也正式在 1862 年 1 月 13 日，在英、美、法三國外交官英國領事夏福禮 (Frederick Harvey)，美國領事孟恩威理 (Willie P. Mangum)，法國孔夫子號 (*Confucius*) 艦長 M. Leon Obry，英國 *Scout* 號艦長 John Corbett 等在美國領事館開會，共同決議，自此大致畫定江北岸洋人租界地區之明確界址。在同一天中發布英、美、法官員所簽合議書，書中申明洋人所畫保護之地界界址，更重要者乃在同日所附江北岸洋人界址地圖，茲將其當時所繪的以紅色塗染之洋人租界圖，以供參考（見圖肆），此圖真是彌足珍貴，同時將英、美、法三國所簽洋人居址地界聲明全文附入小註，自為寧波租界形

⁶⁵ 郭廷以著：《太平天國史事日誌》，臺北，商務印書館，民國65年2月印。附錄：頁164-167。

成之重要文獻。⁵⁶

寧波較上海差強，在於太平天國平定以後，同治4年初（1865）即由地方官寧紹臺道，收回江北岸之管治權。只是警察巡捕，必多僱用洋人，尤其是英人充當。薪金始終由中國地方開支。起始關鍵，乃是當時租界內洋商居民不多，無法負擔全部巡捕經費；中國官方既出薪資，自然順便掌握到警察權。起始經過，可見同治4年2月11日（1865.3.8）寧紹臺道向浙江巡撫之稟報：

詎本年正月二十後，城外江北岸上下白沙等處，查有各國黑鬼流氓，形同乞丐，潛居冷廟破船，或十數人一處，或數十人一處，詰其來歷，言語不通，殊非良善之類。職道即與英、法、美三國領事、新關稅務司會商驅禁。據該領事稅務司等僉稱：此種流氓，多係別國下戶，並無該管領事駐寧，不遵伊等約束，禁之不聽，驅之復來，恐非中國兵勇所能捕盡。必須添派外國巡捕

⁵⁶ PRO. F.O. 405/7, p. 70, 1862年1月13日寧波洋人居址地界圖。

又、PRO, F.O. 405/7, p. 69, 1862年1月13日英、美、法三國官員所簽畫洋人居住界址聲明全文：

Whereas certain forces in opposition to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have captured the city of Ningpo and its surrounding districts; and whereas, in the absence of any Imperial authority, it is necessary for defensive purposes, and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fe and property, and for the general security, order, and good government of foreigners residing at Ningpo. That certain limits should be clearly defined within which those foreigners are to reside free from molestation, aggression, or interference of any kind:—for these purposes, the Undersigned, as the only Representatives of foreign Powers at this port, have this day met together at the United States' Consulate, and have, after consultation, agreed and determined upon the following three Articles:—

1. That that tract of land, or country, or promontory, known as the Keang-pih side, and comprised within the boundaries or limits drawn by the Yung River, the Yu-yaon branch of said river, the Pih-sha-ho creek, and a line drawn across the fields from the Sze-chow Tang (or Temple) to join the Yu-yaon River above mentioned (the whole site forming an irregular quadrilateral or trapezium), shall from this date and thereafter be assumed and considered as the foreign site, within which such foreigners shall reside, free from any interference of any nature whatsoever, subject always to their respective Treaty obligations.

2. The Undersigned reserve to themselves the right to make and establish such Rules and Regulations, within the limits above-mentioned, as the future necessities of the Settlement may render requisite; such Regulations to be in conformity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ir respective Treaties with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of China.

3. The above Agreement, to which the Undersigned have appended their approval and signatures, will be submitted without delay to the High Ministers and Officers of the nations to which the Undersigned respectively pertain and belong.

Done at Ningpo, China, at the time and place above giv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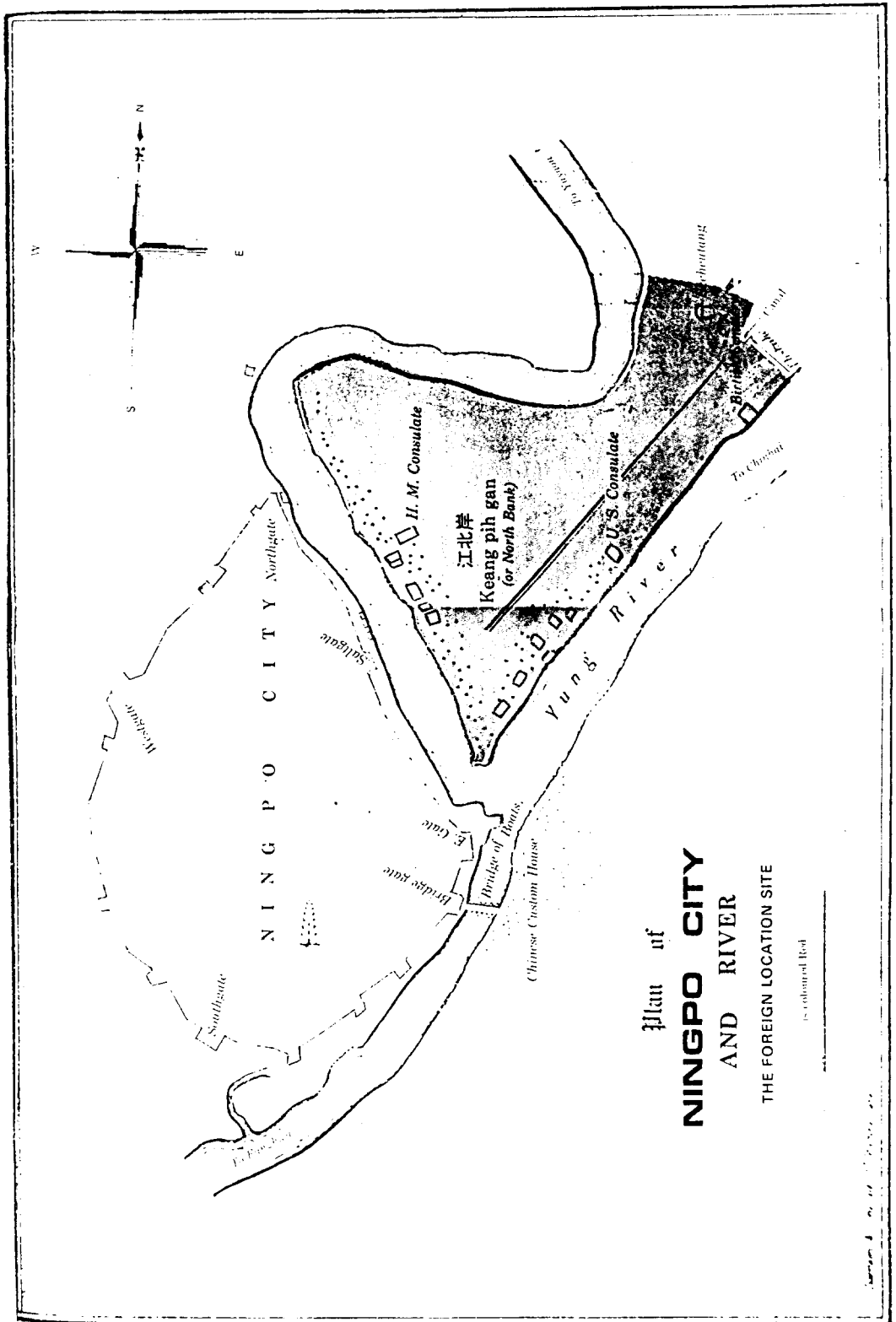
(Signed)

WILLIE P. MANGUM, *United States' Consul.*

JOHN CORBETT, *Captain. H. M. S. "Scout".*

L. OBRY.

FREDERICK HARVEY, *Her Majesty's Consul.*



等兵，嚴密巡邏，制之不敢滋事，使之無所希圖，庶幾不逐自去。惟添派各國巡捕弁兵，每月辛工總需洋銀一千餘元，至少亦需七百元。曩者軍興，江北岸曾派巡捕洋兵防守，係由該處客戶居民洋行釀金捐助，暨抽收房租津貼。現在客戶均已遷徙，房租歸官抽收，各居民洋行每月僅可助洋四百餘元，已屬吃力，總計尚欠洋三百元，外國無款可墊，堅請由寧波捐局每月幫補洋三百元，以二月為始，一俟流氓散盡，再行酌撤等語。職道復與眾紳密籌，事關緊要，若不允其所請，各領事藉口推諉，漸弛其禁，該無業流氓勢必肆無忌憚，搶劫橫行，隱為地方之患。除嚴飭巡緝勇丁城門員弁加意稽察防閑外，理合將會商添派外國巡捕弁兵幫貼經費各緣由，據實稟請憲臺察核。可否由寧波按月幫貼洋銀三百元俾資協巡之處，仰乞批示遵行。⁵⁷

嗣經同治6年(1867)，光緒6年(1880)，光緒10年(1884)，光緒20年(1894)，光緒24年(1898)，以至民國。由於地方官之多方注意外人侵權行徑，歷年防範，終能將租界治權掌握在中國官員之手，使租界無法蛻變成洋人獨立行政界區，亦是寧波地方官紳適應變局之智慧。⁵⁸

六、結 論

都市之形成，地理條件佔有重要因素，為一切發展之原始依據。一般而論，港埠都市，自為水陸交通要道之連接點，具備十字路之條件。利於通商貿易之發展。由地理條件種種環境之限制，對於歷史發展延續，亦具備若干重要影響。此類地理環境影響之程度，或深或淺，對於局部或全面之歷史發展，均必具有相當地位，不可忽略。西方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s)之產生，即在基於地理關鍵以了解政治與

⁵⁷ 《鄞縣通志》，第五，食貨志，頁195。記載中外通商資料特詳，收錄近代開埠以來各類章程、稟帖、照會全文。深得章學誠地方掌故之學之史法。於學者方便參考，彌是珍貴。

⁵⁸ 劉秉璋《劉尚書奏議》，卷4，頁28：再據甯紹臺道薛福成詳稱：甯郡江北岸為通商碼頭，華洋雜處，巡防彈壓，交涉事繁。自光緒六年間整頓章程，改派洋人華生為巡捕房督捕，迄今年久，遇事稟承，於辦理華洋緝捕巡邏諸務，均能妥協，並無貽誤。上年海防吃緊，諭令督帶巡捕於江北岸周歷梭巡，不閒晝夜，得以匪徒斂迹，人心又安，商民信服。他如幫設電線，保護教民各事，尤能始終勤奮，小心認真，不無微勞足錄。詳情附案，奏請給予四等寶星，以昭激勸等情前來，經臣咨准總理衙門核與成案相符，相應仰懇天恩，俯准將寧波口巡捕房總巡捕英國人華生給予四等寶星一面，准其佩帶。

又、李應珏著：《浙志便覽》，光緒22年，杭州史隱齋藏板卷2，頁6：顧通商口岸祇漢口、九江、鎮江、天津、廣州可稱租界。乃彼國向我國租界轉賃商人者，歲由彼領事繳租，故無論中外之人，皆須遵彼國條例，其餘則皆如煙臺條約所稱，洋人居住處乃洋人自向民間價買，須照民間向州縣納賦。一切條例，彼領事不能干預。今祇因各處皆係洋人自設工部局，巡捕局，遂至喧奪奪主，甯口巡捕充以衛安勇，所以無滬上桀驁氣也。

歷史之發展因素。就港埠都市而言，若廣州、泉州、寧波之歷經唐、宋、元、明、清各代，而成對外貿易商埠，其中若干成分，即由其優越地理條件所決定。

相反而言，歷史形成之條件。亦至影響港埠地位之確定。如一種淵源傳統之形成，一種歷史知識之系統。均自然提供港埠位置之參考，並影響及於決定之取捨。1842年五口開關貿易，出於英人之要求，自毫無疑問，純屬新問題，新考慮。為中外通商史上極具關鍵性之開創地位。但追尋其最近線索，至少已種因於十年以前胡夏米之試探中國沿海港口。胡夏米之試探中國沿海，亦並非冒然而行，實有久在中國熟悉中國沿海情勢之教士郭士立伴之隨行，仍然根據中國現時固有貿易港口考察，並非任一泊船之港均加試探。質言之，此即在歷史傳統形成之範圍作觀察與取捨，其所取資之材，自必無法脫開累積歷史知識之參考，亦並難逃出傳統格局之引誘與控制。

英方考慮，明顯是本之於口岸歷史背景之了解。早在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四日(1840. 12. 17)義律與琦善照會中，已正式提出要求中國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個往昔就是通商口岸的港埠。表達出其所要求實非過分：

至於開港一節，原已欽奉國命。所討給予地方一款，倘若實不能行，即應討請以從前曾為通市之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處開港，如舊貿易。併命以尚未開港以前，定海仍應據守不還。惟本公使大臣既知貴大臣爵閣部堂盡心之處，權為酌議，止請將閩浙二省與抑閩蘇二省，各省一處開港，准商往來貿易，此係本公使大臣之所以為貴國承當重責主持不致轉令為難矣。⁵⁹

同時說明出自英國國命，則亦可見英方思慮之深熟，立意之堅強。惟原先英國早經要求永久佔據定海附近小島，則因義律粵東談判中取得香港並迅速佔領，與其價值相同，自即放棄此一想望。不過雖然放棄佔領定海附近小島，卻在五口通商正常開放，中英商務正常發展之際，卻利用外交技巧，騙使者英簽訂不割讓定海之約。當可想見英人之欲壑難填，英國外交詐術之可怕。

至於同樣是洋人在口岸掠奪租界，並畫定地區，何以寧波之江北岸與廣州之沙面，上海之洋涇濱，廈門之鼓浪嶼有差強之不同結果。保存治權與警察權，未使列強自組工部局以統治租界。看來與當地民風無關，因為上海、寧波兩地居民相似，均甚柔順。郭士立並在 1842 年英軍退出寧波後致書樸鼎查，對寧波民情有所評

⁵⁹ 《文獻叢編》，第27期：「關於鴉片戰役之中英交涉事件」，頁4。

論。^⑩其真實原因，當在於寧波外商居民很少，不足以構成居民社會之強烈要求，更確切之點，則由於洋人居民不多，不足自組一個地方政府並維持其市政開支。

以港埠地帶之選擇而言，寧波自北宋以迄清康熙乾隆時期，一直以靈橋門及鹽倉門為對外通商之繁華地帶。及至近代五口通商，寧波商埠竟改在空曠荒僻之和義門北門外。其情勢之改變，與上海開埠之初選定北門外洋涇濱荒僻地帶大致相同。^⑪

附記：本文所附列四幅地圖，皆出於當時英方所繪製，彌足珍視。圖壹係出於 Henderson 之手，1843 年 1 月 16 日所提供。圖貳出自香港由廣州領事 Daniel Brooke Robertson。1862 年 1 月 14 日所提供。圖叁出於 Encounter 號兵艦長 Roderick Dew 所繪。1861 年 6 月 18 日提供。圖肆係出於英、法、美三國在寧外交官，簽訂寧波租界地帶界址之附圖。為 1862 年 1 月 13 日所附列。即具出圖年月，又具繪製者姓名，充分代表當時歷史意義。近數年武漢大學近代史教授蕭致治先生寄贈不少大陸所出鴉片戰爭史中各類書籍論文。除蕭先生大著：《鴉片戰爭前中西關係紀事》一書多加引用外，其他人論文少有相關可採者。即使見及一二篇有關者，亦多不足引稱。在此順便向蕭先生申明謝意。至地圖之安排設計，多承張力先生策劃，使之美觀易讀，全文承王樹槐、林滿紅、魏秀梅三位教授分別代為校訂，免致錯誤，在此一併特申感謝。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七月十八日初稿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庚午重陽節（1990.10.26）改寫於揮泥揮雨軒。

^⑩ PRO, F.O. 17/57, Precis formed from mr. Gutzlaff's private letters to Sir Henry Pottinger, 20th May, 1842.

"Viewing With an impartial eye, Ningpo permit me to make the following observations. During my whole intercourse with the Chinese, I have never seen a more obdient, and gentle race than the inhabitants of that city. They have done every-thing in their Power to Conciliate our good will.

^⑪ 王爾敏撰：外國勢力影響下之上海開關及其港埠都市之形成。收入《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二十八編，上冊。臺北，商務印書館，民國75年8月印。